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 主编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美] 柯文/著

杜继东/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美] 柯文/著

杜继东/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雷 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美)柯文著;
杜继东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海外中国研究/刘东主编)
ISBN 7-214-02808-5

I. 历... II. ①柯... ②杜... III. 义和团运动-研究
IV. 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142 号

书 名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编 著 者 [美]柯文
责任编辑 周文彬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页 2
印 数 1—3 040 册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808—5/K·424
定 价 19.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F1133 / 12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导师
史华慈先生和费正清先生
他们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序 言

xi

哲学家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评论历史学家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写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898—1900年发生于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来考察这个问题。关于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我刚开始研究历史时的看法与现在的看法大不相同。我以前一直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我还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但是,关于解释历史的过程和牵涉的种种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比以前复杂得多。我现在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就抽象的层面而言,义和团起义是清朝(1644—1912)末年历史画卷中的重要篇章。它是19世纪中叶的大起义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间发生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义和团民多是因19世纪90年代初以来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而变得赤贫的农村青少年。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义和团起义是对世纪之交中国农业秩序失衡状况的集中反映。这种失衡——在清帝国的许多地方表现为大规模的民众骚乱——也反映在义和团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他们的降神附体仪式和法术

xi

活动中。义和团运动的排外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义和团对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进攻中——给中外关系带来了严重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外国的军事干涉和中国对列强的宣战。最后，使馆之围被解除，清廷逃至西安，洋人攻占北京，大获全胜的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清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清政府（小心谨慎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措施。芮玛丽在考察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篇文章的开头明确指出：“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①综合义和团运动的各个不同层面来看，芮玛丽之言不足为奇。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事件，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神话，尽管这些神话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义和团的言行使人联想到危险、排外、非理性和野蛮等”。^②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也抱有这种负面的看法，并增加了“迷信”和“落后”两条。但是，到了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高潮阶段，虽然许多西方人试图以“义和团主义”的复活为说辞来诋毁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中国的革命者已开始正面评价甚至美化义和团，说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视义和团为反对外来侵略的勇敢战士的这种正面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大陆地区的中国人（和美国的一些华人）中达到了顶峰，而同一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许多西方人）则旧事重提，说义和团是狂热、野蛮的排外分子。他们还把这种标签贴在了红卫兵身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义和团的同盟军红灯照也大加赞扬，尤其是称赞她们向旧社会妇女的从属地位发起了挑战。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

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两条路径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当我们重新塑造时,过去——更确切些说,是人们经历过的过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历史学家为了说明和解释而把过去整理成“事件”叙述时,或者当神话制造者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从过去提取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信息时,直接创造过去的人的经验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保罗·维恩认为,事件本身与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观察不会完全一致,是历史学家发掘和梳理了他要叙述的事件的有关证据和文献。^④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对理解历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历史学家也是神话制造者吗?如果我们要分析和解释一个事件,要把它分解成若干小事件和个人的经历——如战壕里乏味的生活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不是雄伟壮观的战斗序例,那么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只是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资料吗?或者更乐观些说,当历史学家试图解释过去或神话制造者利用过去的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时,我们得到的是更接近于“真正的过去”的史著吗? xiii

这些问题没有涵盖我在本书中关注的所有方面。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历史学家后来写的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故事”,他们知道事情的结果,对整个事件有全方位的了解,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义和团运动本身,而且是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第二部分考察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为了生存而加入义和团的中国农村青少年,在该运动的高潮阶段散处华北平原各地的忧心忡忡的外国传教士,1900年夏初天津之战期间被困在天津的中国人和洋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简言之,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对整个“事件”没有全方位的了解,因而,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与事后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

根本不同。)第三部分考察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和“义和团主义”的种种神话——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的主旨不在于解释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从义和团的历史中汲取能量,获得政治或宣传方面的好处。^④

xiv 我考察(和比较)意识的这些不同方面的目的,在于说明历史研究工作是难以尽善尽美的,在于解释人们创造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确定的,不变的)与后来的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它似乎一直在变)之间的差异。这与广为人知的“罗生门”效应大为不同。^⑤至少在被吸收进英语以后,“罗生门”指的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即对“真相”的不同看法,这取决于他们与这件事的关系。本书考察的了解过去的不同途径当然包含了观点和视角的不同。但是,这些途径的内涵超出了这一范围,触及到了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不同。过去的经历者不可能知道历史学家知道的过去。神话制造者虽然与历史学家一样知道事情的结果,但他们无意于了解历史的创造者经历的历史。换言之,了解历史的这三条途径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学家也制造神话,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事情结束以后也完全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写入历史),虽然如此,它们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更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大不相同的。

虽然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但我也希望本书能够引起那些关注义和团运动本身及中国人在 20 世纪纪念该运动的方式的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本书最长的一个部分)中,我探究了 1900 年华北民众经历之事——干旱、降神附体、法术与妇女污秽败法、谣言、死亡等——的若干方面,我的探究比描写义和团的许多一般性著作要深入得多。在此过程中,我常把自己当做“人种志专家”,试着以同

情的态度去了解普通人(如义和团、非义和团的中国人及传教士)是“怎样理解世界”^⑥的。我还经常从这个世界回过头去观察和解释过去发生之事,我采用的方法是我正在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所不知道的。

第三部分是针对与上面有关的另外一种问题而展开的。在这个部分中,我叙述了中国人对义和团加以神话化的情况。就本书的广泛目标而言,此项叙述的目的在于从总体上说明神话化的过程。但是,每一个历史事件在该国后来的历史上都有不同的意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 20 世纪中国人追求既接受又排斥西方文化的现代自我认同的痛苦历程中,义和团扮演了具有独一无二的象征意义的角色。 xv

现在谈一谈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有些是自己做出的,有些是环境造成的。其中一个选择与我使用的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有关。正如某些读者已经明白的那样,我有时候从技术的层面使用这个词,用以特指历史学家重塑过去的正式过程。虽然没有人限制历史学家考察和重塑人们经历的去或被人们神话化的过去(正如我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所做的),但从第一种意义上说,历史显然有别于经历和神话。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如本书的书名中,我使用的历史一词含义广泛,较少技术层面的考虑,涵盖了认知历史的各种途径,包括经历和神话在内。我希望读者能通过上下文了解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究竟是第一种含义还是第二种含义。

虽然按照年代顺序来看,本书中关于经历的部分也许应该放在前面,因为过去是先被人们经历,后来才被重塑或神话化的,但是,我却把作为事件的历史放在了前面。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希望本书能引起普通读者(非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对他们而言,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故事性叙述读起,可能更容易产生兴趣。其二,我认为,本书所探讨的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在逻辑上

或认识论上没有哪一条的地位一定比另外两条高。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虽然专业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神话化的过去进行斗争,或者以直接经历者不知道的方式使过去之事变得清楚易懂并富有意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恳请对义和团事件有所了解的读者不要按照本书各部分的排列顺序来阅读,而是按照你们喜欢的任何顺序来阅读。

我的另外一个选择与本书关于经历的这一部分有关。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注重的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潮阶段(1900年春夏,该运动波及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了满洲和内蒙古),而对1900年之前该运动的情况关注甚少——1900年之前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尚处在起始阶段。我做此选择的原因有三。第一,这个部分——共有五章,如干旱、降神附体等——所述的主要现象在1900年春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正因为如此,相关的外文档案和文献比1900年以前更为丰富多样。^⑦第三,关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初起时的情况,我们已有一部极为出色的英文专著: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虽然本书的主旨与周书的主旨根本不同,但是,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到义和团运动的其他阶段,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鸣 谢

xvii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首先要感谢约翰·伊斯雷尔、欧文·沙伊纳、杰弗里·沃塞斯特罗姆和马德琳·泽林,他们都仔细通读了书稿,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建议。我要感谢杜赞奇、洪长泰、迈克尔·亨特、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劳拉·麦克丹尼尔、韩书瑞、詹姆斯·沃森和鲁比·沃森,他们分别对本书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我在科尔盖特、哈佛和韦斯利大学演讲后听到的评论和参加1990年10月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研讨会的学者给我提出的建议,都使我获益匪浅。

在本项研究开始之初,邹明德帮助我从中国获得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报刊杂志上的极有价值的文章。邹先生还介绍我认识了上海图书馆的祝均宙,祝为我搜集了不易见到的“文革”政治漫画。在我开始查阅有关义和团的史料时,盖尔·赫斯哈特就提醒我,天津存有未出版的义和团口述史资料。由于陈振江和南开大学其他学者的慷慨相助,1987年我前往中国时复印了其中的许多资料。在此次访问过程中,我与山东大学路遥教授的谈话也使我获益匪浅,他是中国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权威历史学家之一。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档案管理工作者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对我帮助最大

的是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马撒·伦德·斯莫利和琼·R·达菲、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私人档案原管理员迈克尔·米勒。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管理员们为我查阅美部会档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我既感到愉快，又收获良多。胡佛总统图书馆的戴尔·C·迈耶总是耐心地回答我的问询，为我提供了赫伯特·胡佛和卢·胡佛撰写或收集的许多非常有用的资料——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两位正好在天津。

本书中的许多插图资料是由利萨·科恩翻拍复制的，詹姆斯·埃维亚、鲁道夫·瓦格纳和凯瑟琳·叶为插图资料提出了许多建议，罗伯特·福格特绘制了地图，范达人向我讲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活动的看法，理查德·马德森慷慨地让我参考了他在河北省天主教家庭中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及研究成果，孔祥吉、马静恒和马惟一帮助我理解特别难懂的中文词汇和短语，在此，谨向上述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内奥玛·厄珀姆·斯科特允许我引用她父亲奥斯卡·厄珀姆神父的日记，也感谢助我获得此项许可的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管理员艾米·坎廷。我还要感谢亚洲研究协会允许我引用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1992年2月)上的一篇文章。

与我无数次共进晚餐的希拉·莱文一直给予我热情支持，与我无数次共进午餐的丹尼尔·利特尔经常帮助我理清思路，特别是对一些哲学问题的看法。老朋友丹尼尔·斯特恩多年来不时地和我聚谈，与我交换看法(他的研究领域同我的研究领域虽然不是毫无关系，但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我的观点开始形成之际，另一位老朋友艾伦·莱伯维茨就如何最终将书写成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凯特·威顿伯格是通读本书书稿的一个人。她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当本书被出版社接受时，她又全权负责本书的出版工作，在此谨向她表示诚挚的感谢。在哥伦比亚，我还要感谢罗伊·托马斯，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超的技巧编校

了书稿。

最后,谨向从一开始就对本书的写作表示信任并给予慷慨资助的韦斯利学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和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表示感谢。

目 录

序言 1

鸣谢 7

第一部分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1

绪论 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1

第一章 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 13

第二部分 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46

绪论 人们经历过的过去 46

第二章 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 57

第三章 降神附体 82

第四章 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104

第五章 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123

第六章 死亡 146

第三部分 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179

绪论 被神话化的过去 179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191

第八章 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205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 226

结论 251

注释 261

文献目录 352
